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

刘凤翥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契丹人乘唐末之乱建立契丹王朝之后，出于民族感情和为了适应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需要曾先后创制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这是我国东北少数民族自行创制文字的先声，对于后来西夏文字、女真文字、蒙古文字和满洲文字的产生都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金代前期犹通行契丹文字。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明令废止契丹文字之后，契丹文字才渐绝于世，逐步成为不被人们所识的死文字。契丹文字既已绝世，当然也就没有人能够区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

1922年6月，在内蒙巴林右旗白塔子附近的辽庆陵中，出土了契丹文哀册。这在世界学术界引起了很大轰动。以后契丹文字资料陆续出土，引起了中外学者们的浓厚研究兴趣。以王静如同志为其始，在1933年以后的几年中，掀起了一股研究契丹文字的热潮，加入者日伙，争论日烈，蔚为壮观，遂在学术界产生一契丹文字专业。

早在哀册出土之前，日本的白鸟库吉，西方的布肖尔和马尔克等人就曾根据《辽史》、《燕北录》和《书史会要》的记载，探讨过契丹大小字的问题[1]，但由于资料所限，未能深入展开。随着庆陵帝后哀册的出土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一问题又被提了出来，逐渐形成下列三种意见：

一、羽田亨认为《燕北录》中所收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大字，《郎君行记》和庆陵哀册中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小字[2]。金毓黻也认为辽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小字。他说："余意小字之制，既在大字之后，且数少而该贯（盖先制成字母若干，再合併变化而成多字），则兴宗道宗二陵内国书哀册必契丹小字也。姑先作此假设，以待来日之印证[3]。"

二、罗福成认为辽道宗哀册盖上那种分开写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大字，哀册上的合成字为契丹小字。他说："再考盖文与册文书体之差异，必先将盖文中三十六字合成十五字，以求与册题对照。但于合成之第六字、第九字及第十二字，笔墨之间，则尚有微异。契丹大小字，或即判于此。但于字义，则无别也。盖文倘为太祖所制之大字，则册文必为迭剌皇子所制之小字，两者之不能脗合也，审矣[4]。"罗福成的这种意见后来被日本山路广明加以发挥。山路广明认为，不仅哀册盖上那种分开写的是契丹大字，哀册中由一个原字组成的单体字都是契丹大字，由两个原字以上拼成的合成字为契丹小字。山路广明说："兹说大字，它是自身单独书写，恰如汉字的情况，是一字一音又有一义。……其它几个有附着部分字形的是一个一个的小字。……大字有被用在小字中的情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字是作为一个词的构成要素而为一个音节文字。……如不这样看，在本质上契丹文字中的大字和小字的区别可以说是没有的，可是为了方便，也不是绝对地不可区分的。因为从性质上既然可以区分为写汉语用的和写契丹语用的二种文字，那么以此做为大字和小字的区别我认为是妥当的[5]。”而且山路广明还把四个哀册和《大金皇帝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中的他所认为的契丹大字都一一挑了出来，共得119字[6]。

三、王静如同志认为庆陵哀册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大字，契丹小字是“袭回鹘字母拼以契丹语可无疑矣，其与契丹大字自不相同[7]。”陈述先生起先也持这种意见。陈先生说：“契丹文字，有以回鹘字母拼写契丹语之契丹小字；有以汉隶增损而成之契丹大字[8]。”厉鼎煃也曾有过这种意见。他说：“这誌文〔按指《萧令公墓誌》残石〕的款式和热河辽陵国书哀册大致相同。至于字体完全一样。所以确定这是契丹大字[9]。”由于误信《辽史》皇子表的记载，把契丹小字推测为模仿回鹘文字制式的意见由来已久，早在1897年，布肖尔就曾提出过这种意见[10]。

在只出土一种契丹文字资料，缺乏对比的情况下，产生上述意见分歧是可以理解的。

1935年第10期《满蒙》杂志上发表了另一种类型的契丹文资料，即《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的碑阴文字[11]。然而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1939年又出土了与《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碑阴文字属于同一种类型的契丹文资料《故太师铭石记》。日本的稻叶君山为此发表谈话，指出这不是女真文字，而是区别于庆陵哀册式契丹文字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契丹文字。庆陵哀册式契丹文字既经大家考释为契丹大字，《故太师铭石记》应是契丹小字[12]。后来李文信同志又发表了题为《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的文章论证这件文物[13]。仅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知道李文信同志对契丹大小字的意见和稻叶君山相同。

直到1951年夏，在辽宁省锦西县西孤山出土了与《故太师铭石记》属于同一类型的契丹文字《萧孝忠墓志》[14]之后，有关契丹大小字的研究工作才进一步深入起来。

首先被彻底推翻的是契丹小字是袭回鹘字母以拼契丹语的学说。曾持过这种意见的老前辈们是片面地孤立地理解了《辽史》卷六十四《皇子表》中关于耶律迭剌创制契丹小字的下列一段话：

“迭剌，字云独昆。性敏给。太祖曰：

‘迭剌之智，卒然图功，吾所不及；缓以谋事，不如我。’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迓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

一种文字的产生，是由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而逐步产生的。它绝不是一两个人在短期内所能创制出来的。它一定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过去史书由于受唯心史观的支配，往往把一些重大发明记在帝王将相的身上。例如黄帝发明指南车，黄帝的妃子嫘祖发明养蚕，等等。汉族是如此，其它兄弟民族亦如此。例如《辽史》中就把契丹大小字的发明权分别授予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和他的弟弟耶建迭剌。这是不能轻易相信的。王静如同志就曾怀疑过辽太祖创契丹大字说。王静如同志说：“至若创制之人，虽史称太祖，然余恐其力有所不胜，或竟非其所为亦属可能[15]。”这是很有史识的独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到见解。大字可以怀疑非辽太祖所创，小字当然也可以怀疑非耶律迭剌所独创。

再说在整个契丹王朝，当时竟找不到一个通习回鹘语言文字的，似属不太可能。本不通习回鹘语言文字的耶律迭剌与回鹘使者相处二十天，在繁忙的接待任务之暇竟能学会了回鹘语言和文字，这未免有点“天才论”的味道。退一万步讲，契丹小字的创制者确是耶律迭剌，他确实能在二十天内学会了回鹘的语言和文字，那么也从中得不出契丹小字必然是借用的回鹘字母来拼契丹语的结论。契丹小字是袭回鹘字母以拼契丹语的意见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猜测性的联想。

当两种类型的契丹文字即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和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都出土之后，两种文字的字形都象汉字，没有一种是袭的回鹘字母。因而那种猜测性的联想就不攻自破。曾持过这种意见的学者们也纷纷做了自我修正。例如厉鼎煃首先自我修正说：“过去我和有些学者都以为这六种〔按：指四个哀册和《萧令公墓誌》残石以及《郎君行记》〕都是契丹大字，应修正[16]。”王静如同志认为属于庆陵哀册式的《萧仲恭墓誌》“铭文是用契丹小字写刻的[17]。”从而修正了他的契丹小字是袭回鹘字母以拼契丹语的意见。陈述先生提出了“有以回鹘字拼写契丹语之契丹小字”的意见后，虽然曾说：“其事别详。”但三十年后“详”的不是这种意见而是与此相反的庆陵哀册式为契丹小字的意见[18]。从而也修正了他在《契丹史论证稿》中原先所持的意见。

其次也推翻了罗福成和山路广明的意见。事实不是在庆陵哀册式的文字中既有契丹大字又有契丹小字，而是在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之外还有一种契丹文字。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不管它是单体字还是合成字，只能是一种契丹文字，或者是大字，或者是小字，不能兼而有之。事实虽然如此，国外仍有个别学者至今仍持这种“兼而有之”的意见[19]。

在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于1956年发表之后，直到1963年苏联的沙夫库诺夫还把契丹文字与女真文字混为一谈，把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称为“契丹——女真小字”，把永宁寺碑上的女真文字称为“契丹——女真大字[20]。”竟不知另外还有《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故太师铭石记》和《萧孝忠墓誌》式的另外一种契丹文字已公诸于世。既说明其荒唐，又说明其无知。其有关契丹大小字和女真大小字的意见竟然荒唐到不屑一驳的地步。契与字就是契丹字，不能同时又是女真字。女真字就是女真字，不能同时又是契丹字。二者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

问题最后集中到庆陵哀册式和西孤山式的两种契丹文字中何谓大字何为小字的问题。

阎万章同志是我国研究西孤山式文字的创始人。他对契丹人用五行代十干，用十二兽代十二支的见解不仅对西孤山式就是对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的解读都有着指导意义。他释出的《萧孝忠墓誌》和《故太师铭石记》中的部分契丹字也是经得起检验的。但他在有关契丹大小字的问题上并没有创新，仍然因袭了稻叶君山和李文信同志的意见而加以发挥。他认为庆陵哀册式的是契丹大字，西孤山式为契丹小字[21]。

与阎万章同志相反的是金光平和曾毅公二先生的意见。他们曾合撰《锦西西孤山契丹文墓誌试释》一文，该文摘要刊于《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83至84页。他们认为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小字，西孤山式的为契丹大字。他们关于庆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陵哀册式契丹文字的意见实际是采用了金毓黻先生的意见而加以发挥。已故金光平先生又写了《从契丹大小字到女真大小字》一文[22]，进一步论证了这个问题。

从此之后就形成了这样互相对立的两派意见。同意、采纳或发挥金光平先生意见的有厉鼎煌[23]，王静如同志[24]，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联合组成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25]，陈述先生[26]和日本清濑义三郎则府[27]。日本丰田五郎虽然管西孤山式契丹文字叫契丹隶字，管庆陵哀册式契丹文字叫契丹拼字，但又说"隶字系以前造的大字，拼字是小字，如此解释，恐无差错[28]。"实际上也是采用的金光平先生的意见。同意和采纳阎万章同志的意见的有《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简史》和《中国通史》第六册等。

我从1973年以来也是采用的金光平先生的说法[29]。除了不同意阎万章同志的意见之外，对金光平先生的结论是同意的，但对金先生的一些论证并不全盘接受。现在除了对阎、金二位的意见做些商榷之外，同时提出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一个问题是学术问题不能靠多数表决来做结论，而应靠摆事实讲道理来以理服人。阎万章同志认为庆陵哀册式契丹文字"经国内外多数学者确定为契丹大字，可知（萧孝忠）墓誌中的契丹字应是迭剌所制的契丹小字[30]。"阎万章同志所指的国内外多数学者中大多都是在《故太师铭石记》和《萧孝忠墓誌》出土之前的意见，应当对这些意见做历史的和科学的分析。他们在缺乏对比材料的情况下片面地理解了《辽史》皇子表中的一段话，做出一些猜测是可以理解的。西孤山墓誌出土之后应当用新材料订证他们的错误，而不应墨守他们的过时见解。如前所述，他们自己还纷纷进行自我修正，别人更没有必要固持他们的过时见解。仅就国内而言，阎万章同志所指的那些学者中除了罗福成没来得及在生前进行自我修正外，现在全部都进行了自我修正，而罗福成的见解又与阎万章同志的意见不完全一致。至于国外学者的意见也多半是因袭的中国人的意见。

根据《辽史》皇子表的记载，契丹小字的特点是"数少而该贯。"《郑恪墓誌》说郑恪"通契丹语，识小简字[31]。"从而得知契丹小字又有"简"的特点。两派意见都坚持用"数少"、"该贯"和"简"，这三项标准来衡量契丹小字，只是每方对这三项标准的理解不同因而结论也就不同。

我认为，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表面现象是数少而简，实质上是数多而繁。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表面现象是数多而繁，实质上是数少而简。我们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科学地辩证地分析这些问题。

庆陵哀册的契丹文字是由一些原字反复排列组合而拼成的。它的每个字，与其说它是字还不如说它是单词。构成单词的原字根据现有材料统计，日本的长田夏树认为是327个[32]，郑绍宗同志认为有402个[33]，契丹文字研究小组认为是378个[34]，陈述先生认为是"宽算也不到300个[35]。"长田夏树是在《萧令公墓誌》残石、《萧仲恭墓誌》、《许王墓誌》和《故耶律氏铭石》发表之前所做的统计，因而数字偏低，情有可原。郑绍宗同志把一个字的楷体和行草体分别做了统计，甚至把有的一个原字折成两个，所以数字偏高。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统计数字与其说是原字数还不如说是他们所制的契丹字铜模数，其中既有把楷书与行书分别造模的情况，又有把根本不是契丹原字的重复符号当做原字的情况，也有把仅在抄本传世的《兴宗哀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册》和《仁懿哀册》中偶有出现的极少数怪字与其它资料中的相似字进行归併的情况。去其重复实际并没有378个，约在350个左右。327、402、378三个数字都列出了具体数字，令人一看即知缺了什么、重复了什么。而“宽算也不到300个”的意见由于没有列出具体数字，令人无法知其究竟。

正如同26个英文字母可以把所有英语拼写出来一样，约350个契丹原字可以把所有契丹语拼写出来。庆陵哀册式契丹文字的原字只有350个左右这是它“极少”的本质；它可拼出无穷无尽的单词，这是它“数多”的表面现象。其实前者正是《辽史》中所说的“数少”，后者正是《辽史》中所说的“该贯”。“该贯”一作“賅贯”。据《康熙字典》转引《玉篇》、“賅”是“非常”之意。又据《康熙字典》转引《广韻》，“该”为“咸”“皆”之意。“贯”即“贯通”之意。据陈世林同志解释，该贯谓概括得全面而系统。这正是哀册式契丹文字书写符号少却能全面而系统地表达契丹语的特点。

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出土材料比庆陵哀册式的少，我们仅根据对《萧孝忠墓誌》、《耶律延宁墓誌》、《北大王墓誌》、《应暦碑》、《辽太祖纪功碑》残石和辽上京出土的残石的粗略统计，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约有八百三十余字，如果算上《故太师铭石记》则有一千一百余字。因《故太师铭石记》不仅原石下落不明，寻找一份原拓片也一时没能办到，仅仅根据不清晰的拓本照片进行统计难免有鲁鱼之讹，不足为凭。我们做一些压缩，这种文字约有千字是不在话下的。而庆陵哀册式的原字只有它的三分之一，二者之间哪个数多，哪个数少，不是昭然分明了吗。这里应该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资料多，西孤山式的资料少。这里的多和少是指文物的件数和每件文物的字数而言。资料多的书写符号少，资料少的书写符号反而多，这难道不发人深思吗？第二是长田夏树仅仅根据四个哀册和《郎君行记》的统计，庆陵哀册式的契丹原字就有327个之多。解放后又发现了《萧令公墓誌》残石、《萧仲恭墓誌》、《许王墓誌》和《故耶律氏铭石》、增加了这么多新资料，而原字如前所述总共不过350个左右，才增加了不足三十个。也就是每增加一件新文物，新的单词虽有出现，而书写符号——原字却增加不了几个，甚至一个也不增加。与此相反，每出土一件西孤山式的契丹字文物往往伴随着出现一批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这正如同一页英文书虽然仅仅用了有限的英语单词，但却把26个英文的书写符号——字母差不多用尽了，再增加一页英文书也多不出什么字母和一页汉文书仅仅是用了有限的汉字，再增加一页汉文书便会出现很多新的汉字一样。可以断言：今后再出土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新的原字肯定会增加，但数量一定不会很多。而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肯定还会出现很多的新字，也就是说两种文字的字数距离还会进一步拉长。

现在再说一下“简”。所谓简，有两层意思：一是笔划简，也就是笔划少；二是用起来简便。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正合这两方面的意思。在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统计表中，378个中没有一个是十划以上的，十划的也仅有两个字，其中一个字仅在手抄本中出现过一次，另一个字则可视为两个原字的合体字，九划的没有，八划的也仅仅有几个，而常用字多在六划左右。而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则不然，现有资料中最多的笔划为十五划，有一字，十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四划的也有一字，十三划的有二字，十一划的有三字，十划的有十二字，九划的有二十六字，八划的有六十六字。两两相比，庆陵哀册式笔划简，西孤山式笔划繁。

再从使用方面看，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语言特点是单词多音节，用粘着词尾来表示语法现象，有元音和谐律。这种语言用表意文字不太方便，用拼音文字较为简便。根据研究，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基本上是拼音文字，例如“殿”字是由三个原字拼成，而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则直接借用汉字“殿”，看不出任何拼音的现象。庆陵哀册式契丹文字粘着词尾也很方便。而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由于每个音缀仍是来自汉字的方体，无法联写，这就形成各音缀相互分离，各个多音词之间不易截断的缺点，行用起来很不方便[36]。”因而无论从笔划的繁简上还是从使用是否简便上，“简”字只能放在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上，而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则恰恰与此相反。

这样以“数少”、“该贯”和“简”三方面来看，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应为契丹小字，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应为契丹大字。

在只创造了一种契丹文字时，就只叫契丹文字。无所谓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当由于初创的契丹文字使用起来不方便，又创制了一种契丹文字的时候，为了区分起见，才把先创制的称契丹大字，后创的称为契丹小字。契丹大小字的区别不是因为字写的大小，而是因由于创造先后不同而具有不同特点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大字可以写小，小字也可以写大。有些同志往往带着小学生写大字和写小字的固有观念每每问我，契丹大小字是否因为字写的大小不同而得名？每遇这种情况，我往往颇费口舌才解释清楚。其实大小正如同人的年龄大小一样，先创者为大，后创者为小。

按着文字的一般发展规律，后创的文字一定比先创的文字进步，否则后创文字就失去了产生的意义了。两种契丹文字都是以汉字字形为借鉴而创造的文字。但不是生搬生套，而有一定的创造性。契丹人首先发现了汉字笔划繁字数多的缺点，现有的契丹大字（即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下同）中笔划最多的才十五划，只有一字，多数字集中在四划至七划之间，四划的有一百五十一字，五划的有一百七十六字，六划的有一百六十六字，七划的有一百三十二字，其它各划的均不满百字。现有契丹大字的字数也不过千字左右，既使按《契丹国志》上说的契丹大字有“三千余言[37]”，也比汉字少得多。契丹小字（即庆陵哀册的契丹文字，下同）进一步克服这两大缺点，把字数缩减到四百字以下，把笔划也都缩到十划以下。这种逐步简化的道路也就是逐步前进的道路。前进到一定阶段，由量变到质变，于是产生了一个飞跃。这就是由表意文字前进到拼音文字、契丹小字虽然还是汉字形体结构，但它与汉字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就是它是拼音字，而汉字是表意文字。契丹小字虽然还处于拼音文字的初级阶段，但它却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这充分说明契丹族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数少”“该贯”和“简”这五个字集中概括了契丹小字的进步性。它不仅比汉字进步，也比契丹大字有着本质性的进步。正因为契丹小字进步，所以它有强大的生命力，在现今留下来的契丹文字资料中，契丹小字资料比契丹大字资料为多，这未必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契丹小字还处于拼音文字的初级阶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段，所以它的原字有三百多个，因而有一音多字现象。如果这种文字不是随着其民族的消失而死亡，它一定会按着文字发展的规律进一步减少字数。这种由减少笔划，减少字数而走向拼音的道路，适足可以做为今天汉字改革的借鉴。

过去的史书已把契丹大字的发明权授予辽太祖，为了表示对辽太祖的尊敬，他陵墓前纪功碑上的字理应是契丹大字，而他的纪功碑上的字恰是汉字和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两种[38]。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大字。

顺便指出，金光平先生把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分别说成是"民间文字"和"官方文字[39]"的意见似欠妥。语言文字由于没有阶级性，因而无所谓官方或民间之别，谁都可以用。从使用情况看契丹大字既给皇帝（辽太祖）刻碑，也给大臣（北大王，耶律延宁、萧孝忠）刻碑；契丹小字也是既给皇帝（兴宗、道宗）刻碑，也给大臣（萧令公、萧仲恭）刻碑。其间没有什么官方民间的区别。

还有，金先生先假设女真大字仿自契丹大字，女真小字仿自契丹小字，然后证明西孤山式为契丹大字的证明方法[40]也由于以空对空而不能令人信服。首先，现在传世的女真文字只有一种，由于缺乏比较，无法断定其为女真大字还是女真小字。传世的女真文字固然与庆陵哀册的契丹文字比较起来更近似于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焉知以后另一种女真文字出土之后不会更加近似于西孤山式。就是传世的这种女真文字也有采取庆陵哀册式契丹文字的组合情况的[41]。所以从女真字证明不出西孤山式的契丹字是契丹大字来，必须抓住"数少""该贯"和"简"的本质进行分析。

本文就是从"数少"、"该贯"和"简"的契丹小字的特点，通过上述的具体的和辩证的分析得出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大字，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小字的初步结论的。同时对一些不同看法也做了历史地和具体地分析。学术问题应该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讨论来解决。本文但愿能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而引起大家进一步讨论，从而达到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另外，朱子方同志和柳翼谋也都写过有关契丹大小字的文章[42]，由于时代和题目所限，他们都没有触及传世的两种契丹文字何为大字何为小字的问题，因而在此不加评论。

注

① 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载1898年《史学杂志》第九编第十一、十二号。

② 羽田亨：《关于契丹文字的新见解》，载1925年《史林》第十卷第一号。

③ 《辽陵石刻集录》绪言。

④ 罗福成：《道宗仁圣皇帝国书哀册考》，载《辽陵石刻集录》卷四。

⑤、⑥ 山路广明：《契丹大字考》，载1942年《浮田和民博士还历纪史学论文集》。

⑦ 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册，1934年。

⑧ 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国立北平研究院1948年版，110页。

⑨ 厉鼎煊：《义县出土契丹文墓志铭考释》，载《考古学报》1954年第8册。

⑩同②。

⑪ 山下泰藏：《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载《满蒙》第16年第10号，1935年。

⑫ 见1939年9月30日长春《大同报》和沈阳《盛京时报》。

⑬ 李文信：《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载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简丛》第3号，1942年。

⑭ 刘谦：《辽宁锦西西孤山出土辽墓墓志》，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⑮同⑦。

⑯ 厉鼎煊：《试用古回鹘文比较研究契丹文字》，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2期。

⑰ 王静如：《兴隆出土金代契丹文墓志铭解》，载《考古》1973年第5期。

⑱ 陈述：《契丹文字的历史概况》，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

⑲ 田村实造：《契丹女真文字考》，载《东洋史研究》第35卷第3号，1976年12月，西田龙雄：《契丹文字解读的新进展》，载《言语》月刊1981年1、2、3号。

⑳ 沙夫库诺夫：《契丹一女真小字解读问题》，载苏联《东方铭刻学》第十五册，1963年列宁格勒出版。

㉑ 阎万章：《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参见69至72页。

㉒ 载《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62年第2期。

㉓同⑯。

㉔同⑰。

㉕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契丹小字研究专号。

㉖同⑱。

㉗ 清濑义三郎则府：《女真音再构成考》，载《言语研究》1973年第64号。

㉘ 丰田五郎：《契丹隶字考》，载《东洋学报》第46卷第1号，1963年6月。

㉙ 见拙辑《契丹大字资料汇辑》前言，1973年油印本。

㉚同㉑第71页。

㉛ 据自藏手拓墨本。

㉜ 长田夏树：《契丹文字解读的可能性》，载《神户外国语大学论丛》第2卷第四号。

㉝ 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载《考古》1973年第5期。

㉞同㉕。

㉟同⑱。

㊱ 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第一版。

㊲ 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一。

㊳ 贾洲杰：《内蒙古昭盟辽太祖陵调查散记》，载《考古》1966年第5期。

㊴ ㊵同㉒。

㊵ 拙撰《女真字“国诚”银牌考释》，载《文物》1980年第1期。

㊷ 朱子方：《契丹大小字创制之年代问题》，载《东方杂志》1946年第42卷第14号，柳翼谋《契丹大小字考》，载《地理学报》第2卷第6号，1923年8月。

征 稿 启 事

蒙文版《内蒙古社会科学》将于今年下半年正式创刊，主要刊载蒙古族和北方各少数民族有关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包括畜牧业经济学）、历史学、法学、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学、军事学、考古学、美学、民族学、档案学、图书学、人才学、社会学、地方志、宗教学、科学学、党史学、新闻学、自然辩证法等方面的理论学术著述。我们欢迎专业的和业余的从事上述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的同志踊跃为本刊撰稿，特别欢迎直接用蒙文撰稿。来稿请用标准稿纸书写清楚，并注明作者的工作单位、出生年月、学历、学术、职称、主要著述等，以便建立作者档案。

来稿一经刊用，即按规定致酬，未经采用的稿件一般不退稿，请自留底稿。

来稿请寄《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蒙文版编辑部。地址：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4号

《内蒙古社会科学》蒙编部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